



一个思想者的精神跋涉

——读《理想，还需要吗——韩少功谈话录》有感

刘昌宇/文

以“寻根文学”蜚声文坛的韩少功，多年来，凭借其跨文体的写作和深邃的思想，而被大众所瞩目；他也因此赢得了“作家中的思想家”的赞誉。在他新近推出的随笔集《理想，还需要吗——韩少功谈话录》（海南出版社2025年7月出版）中，韩少功再次以其恣肆汪洋的笔力和喷薄的思想张力，延续了他一贯的写作风格，展现出他对时代问题的持续叩问与深度思考。

本书以访谈的形式，通过韩少功与多位作家、艺术家、学者的真诚对话，让我得以走进这位重要作家独特的文化追求和宽广的心灵世界。他们谈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文学、哲学、科技、历史等多个维度。其中，在我们关注的文学领域，韩少功就以他的两部作品《马桥词典》和《爸爸爸》为例，阐释了文学应该怎样解决“地方性与世界性”的命题。在他看来，文学虽然立足于一定的文化土壤，但作为作家，要自觉超出地域的限制，力求在题旨上揭示出作品的普适意义，这样的作品，才“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而就文学创作中，如何“批判性继承”传统文化的诘问，韩少功建言我们的文字工作者，应具备“考古学家”的耐心和“外科医生”的精准，既要深入传统的肌理，又要保持必要的理性判断，这种辩证思考在当下显得十分珍贵。韩少功的文学敏感性，还体现在他对方言写作的力推上，他认为方言中蕴含着特定地域的生活智慧和情感密码。这种文化自觉，使他的创作既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又获得了超越地域的普遍意义。

面对当代社会的复杂命题，韩少功的书中呈现出一个思想者的清醒与定力。在关于AI的讨论中，他没有陷入技术决定论的窠臼，而是冷静地分析了人工智能对文学创作可能带来的影响。并指出，AI技术再先进，也无法替代人类的情感体验和创造性思维。这种观点在当前AI热潮中显得格外清醒。在他看来，文学创作的核心不是技巧的炫耀，而是生命体验的真诚表达。书中，关于“知行合一”的讨论尤其令人动容。韩少功不满足于做一个书斋里的思想家，而是将思考延伸到生活实践中。他详细讲述了自己在江南乡村的生活经历，如何将文学思考转化为具体的乡村实践。他对中外文化交流的思考同样体现了一个开放的思想者的胸襟。作为米兰·昆德拉作品的重要译者，韩少功既能看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价值，又能保持中国作家的主体意识。他认为，文化交流不是简单的模仿或对抗，而是要在对话中实现创造性转化，这种文化立场使他能够以更开阔的视野思考中国文学的未来。

“次优主义”是韩少功在书中阐释的一个极具启发性的概念。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他既不满足于乌托邦式的空想，也不陷入悲观主义的泥沼，而是提出了一种务实而积极的生活哲学。他认为，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追求“次优”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这种思想既承认现实的局限性，又保持改善现实的努力，体现了一个成熟思想家的智慧。韩少功对历史问题的思考同样具有这种辩证性。在讨论20世纪中国历史时，他拒绝简单的二元判断，而是试图理解那个特殊时代的复杂性。他指出，历史评价需要避免“玫瑰色眼镜”和“墨镜”两种极端，要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把握事物的多面性。这种历史观既避免了怀旧式的美化，也超越了简单的否定，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思想深度。

韩少功是个倡导多思的作家，无论是在谈论文学创作还是在畅聊社会问题时，他都能保持自己独特的思考方式；既有对具体问题的深入剖析，又不失宏观的历史视野；既坚守核心的人文价值，又保持开放的学习态度；既有严肃的思想探索，又不乏幽默的生活智慧。读完本书，感受到他将文学感受力、哲学思辨力、历史洞察力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思想特色。这种能力也使他在跨界写作中，为我们的文学界和思想界，发出了重要的声音。

《理想，还需要吗》这个看似简单的提问，实则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内涵。通过这本谈话录，韩少功给出了自己的回答：理想不仅需要，而且必须。但这种理想不是脱离现实的空想，而是扎根于生活实践的思考；不是高高在上的教条，而是融入日常生活的信念。他在书中留下的这些深邃思考，还需我们去用心体会……

颤动的花瓣

——读《花朵小史》有感

夏学军/文

卡西亚·波比是英国知名自然人文写作作家，阅读他的《花朵小史》，如同步入一个鲜花盛开的世界，犹如十六种鲜花插在一个大花瓶里，错落有致，芬芳四溢。

这本书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植物学科普书籍，而是一部以花为媒介的文明解码录，以花卉为线索，串联起古希腊神话、中世纪宗教、维多利亚园艺、东方禅意与现代消费文化，揭示人类欲望和信仰的投射。

花事即人事，花情即人情，人类将最私密的情感与叙事，悉数寄托于花瓣之间。作者将花卉种类分布在四季，春：雏菊、水仙花、百合花、康乃馨。夏：玫瑰、莲花、棉花、向日葵。秋：藏红花、菊花、万寿菊、虞美人。冬：紫罗兰、天竺葵、雪滴花、杏花。

花朵的象征意义从未被恒定，以康乃馨为例，康乃馨不会抛弃花瓣，枯萎时仍紧拥花瓣于怀中，正如母亲也是这样拥抱着自己的孩子，母爱永不枯竭。所以，我们习惯将它送给母亲，表达感恩、尊敬、祝福的心意。而本书告诉我，康乃馨是古希腊人献给宙斯的神圣之花。书中还披露，爱尔兰作家王尔德的粉丝曾佩戴绿色康乃馨挑衅社会规范，将花朵变为先锋艺术的宣言——这一细节足以颠覆人们对康乃馨“温顺”的刻板印象。

同样，雏菊从中世纪诗歌中的“女性美德”化身，到捷克电影里反叛少女的标识，展现了符号在时代更迭中的弹性。

波比的笔触兼具博物学家的严谨与文学家的敏感，不仅追溯文化史，还解剖花的生物特性：雏菊柔软外表下的复杂结构象征生命的韧性——雏菊在我心中依旧是单纯美好可爱的那个样子；莲花“自洁”的叶片启发现代防水材料研发——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玫瑰在基督教神学中象征神性之爱，却在作者笔下成为都市欲望的隐喻；向日葵既是梵高画笔下狂热的精神图腾，也是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中净化土壤的实用植物，展现了自然与文明的复杂纠葛。

我注意到书中特别关注了东方花卉的文化投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只是到他屋子东边的篱笆处采摘菊花，无意间看到南山的盛景。这首诗具有哲学意义，暗指此地与彼地、寻常生活之短暂性、无垠世界之永恒性之间的紧密联系。菊花在后来的中国文化中获得的意义大多源自这几行诗。菊花逐渐与重阳节这个古老的节日联系在一起，把凝结于菊花花朵和叶子上的秋露视为青春的灵丹妙药，至少是晚秋的精髓。”

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对现代社会议题亦有深刻洞察。《棉花》这篇，之所以令我印象深刻，是因为它触目惊心的故事，作为工业革命核心作物，其种植史暗含奴隶贸易的血泪。这种将微观植物与宏观历史相结合的写法，令《花朵小史》超越了单纯的文化读物，成为理解人类文明演进的重要切片。

科学与人文的跨界叙事，学术性与可读性兼具的作品，让作为读者的我意识到：一朵花既是基因的杰作，也是文明的产物。每篇以植物学特征开篇，随即转入历史考据，最终升华为哲学思辨。当我们凝视一朵花，看见的是宗教的虔诚、革命的狂热、爱情的悸动，抑或是商业的算计？答案或许如作者所暗示：一切都在流转，唯有人类对意义的追逐永恒不息。

全书装帧设计呼应主题，每翻一页皆有新惊喜，我体会到这种细节设计暗合作者“让花朵重新定义生活美学”的创作理念。书中收录梵高、蒂索、莫奈等艺术家的花卉画作，将植物学图谱与美学表达并置，形成独特的“图文互证”体系。

对于热爱自然与人文的读者而言，这无疑是一本献给所有曾为花朵驻足之人的书。我的阅读体验不仅是一场视觉与智性的盛宴，更是一次重新发现日常生活之美的精神远足，它提醒我们，每一瓣花叶的颤动，都是文明史的余震。

长安月色浸俗尘

——读《浮世长安》有感

王婉若/文

程蔷与董乃斌的《浮世长安》以文学与民俗学为经纬，细细铺展唐代民俗的肌理。这部著作避开宏大的历史叙事，将目光专注于市井瓦肆的细碎光景，从岁时流转 to 日常起居，全方位勾勒出唐代社会的鲜活图景，让长安的烟火气从字里行间自然漫溢开来，让我仿佛打开了一扇扇通往盛唐的窗，得以窥见那个时代最真实的呼吸与脉动。

在岁时节日部分，书中以《朝野金载》与苏味道的诗句为证，生动还原了上元节朱雀街的灯海盛景。二十里长的灯轮次第亮起，如同一条璀璨的火龙蜿蜒在长安的街巷，火焰跳跃间，将周遭的建筑、行人都染上暖融融的光晕。仕女们臂上的夜光珠在灯影里流转，与灯轮的光芒交相辉映，卖“消夜”的食车穿梭其间，酥饼裹着蜜糖，汤面冒着热气，胡饼炉上还沾着昨夜祭灶的糖霜，那一点点甜意提醒着人们时序的更迭。寒食节的炊烟带着淡淡的草木香，从家家户户的烟囱里升起，清明的新火则在炉膛里噼啪作响，点燃新一季的希望，书中这些节令标识串联起唐人对自然节律的遵循与对生活的热爱。

书中都市生活章节，西市与东市的风物对照展现出长安的包容与多元。波斯商人的琉璃盏在阳光下折射出七彩光芒，与越窑的秘色瓷在酒肆里并置，胡姬旋转的舞裙扫过穿圆领袍的举子靴底。《酉阳杂俎》中“市人卖胡琴”的记载与白居易笔下胡旋女的舞姿，佐证了当时胡风的盛行。坊市制度下，日暮街鼓敲响，坊门闭合的吱呀声中，有提灯归家的小吏、送家书的驿卒、交换信物的少年男女，规整的格局里渗出浓浓的烟火气。

在妇女习俗部分，书中紧扣史料，从温庭筠“小山重叠金明灭”的词意切入，考证出“额黄妆”受佛教造像影响。书中依《唐六典》述后宫贵妃翟衣的规制，繁复花纹彰显皇家奢华，又与市井女子“红裙妒杀石榴花”的张扬形成对比，显露出阶层审美差异。七夕乞巧时，少女们在月下穿针，铜镜映着蛛网般的针影，案上瓜果沾着晨露，民间流行将萤火虫装入纱囊作“七夕灯”，与宫廷琉璃灯辉映，流露着女子们的心事。

在述及文人风貌时，书中书写基于文献，跳出“诗酒风流”的框架。李白与贺知章“金龟换酒”，是文人知己情谊的流露；杜甫“朝扣富儿门”，展现出困顿中的坚守。王维在辋川别业用松针煮茶，透着超然闲适；白居易在宅院里教家妓弹《霓裳羽衣曲》，显露出生活的雅致。应试举子聚在平康坊，就着胡姬的琵琶声修改诗稿，字里行间凝聚着寒窗苦读的汗水与对未来的憧憬，这些场景都是书中对文人生活的真实还原。

在神灵崇拜章节，书中挖掘出唐代人的精神世界。长安城的城隍庙与西市的袄祠相邻，一边是百姓祈求风调雨顺的香火，一边是胡商祭拜火神的仪式，宗教信仰在市井间和谐共存。腊月二十三用糖瓜粘灶王爷的嘴，带着几分狡黠的敬畏；中元节江放河灯，万千烛火顺流而下，与祭祀鼓声相和，照亮生者对逝者的思念。

书中民间技艺部分如一场精彩的百戏表演。唐代的皮影戏“灯影里的三国”让观众沉醉，街头的“踏歌”充满活力，舞步里可见西域乐舞的影子。胡商在西市表演“吞刀吐火”，实则利用了硝石与硫磺的化学反应，《酉阳杂俎》中“剪纸为马”的故事则充满奇幻色彩，被施了咒的纸片在月光下奔腾，为民间技艺增添了浪漫想象。

翻阅这部书，它的每处细节，都源自书中对唐代岁时节日、都市生活、妇女习俗、文人风貌、神灵崇拜、民间技艺的考证与精彩描摹。通过阅读，当我触摸到文字里的上元灯影、七夕萤火、坊市炊烟，便是触摸到了书中构建的唐代生活肌理，仿佛被它带进那个繁华而充满烟火气的时代。

病菌与人类文明的千年博弈

——读《微生物大历史》的思考与启示

邓勤/文

在雅典卫城的残垣断壁间，索福克勒斯曾借《俄狄浦斯王》道出瘟疫的天谴隐喻；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上，飞天手持药钵的意象暗藏治病祈愿。人类与微生物的博弈史，始终缠绕着文明的基因。挪威奥斯陆大学教授斯蒂格·弗勒兰几乎毕生专攻传染病和微生物造成的免疫反应，从事相关科学研究的同时，投身一线临床治疗。阅读他的著作让我深刻体会到，弗勒兰认为，在一定程度上，能否对未来传染病持乐观态度，需要取决于特定的前提条件。如果我们的社会缺乏合理的组织，那么再深入的认知，再先进的医疗技术，都将无力对抗微生物的威胁。

弗勒兰所著的《微生物大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12月），以横跨医学、生态与社会史的宏大视野，将这场持续万年的微观战争置于文明演进的聚光灯下，揭示了一个让我感到震撼的真相：人类历史的每一次重大转折，都伴随着显微镜下惊心动魄的生死竞速。全书涵盖《瘟疫流行：悲剧的轮回》等十章内容，巧妙融合微生物学、免疫学与传染病学，堪称一部引人入胜的生物社会学佳作。作者生动描绘了人类与微生物的斗争历程，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地展现了人类在疫苗、抗生素等医学突破中的努力，以及生态环境改变对博弈的决定性作用。书中前瞻性地探讨抗生素耐药性、生物武器、新发传染病等威胁，提出应对之策，使我充分认识到这场斗争的复杂性与漫长性。

本书时空跨度惊人，从万物黎明到太空探索，从中世纪瘟疫到新冠大流行，梳理五次流行病学转型，构建人类-微生物-环境三位一体模型。这种独特视角，让我不仅看到微生物对健康的直接威胁，更洞察到其对文明演进的潜在影响，如黑死病加速欧洲中世纪终结，天花重创美洲原住民文明，深刻诠释了“疫病改变历史”这一内涵。书中对“人类微生物组”的阐述是一大亮点，揭示了微生物与人类密切共存的事实，以及肠道微生物组与疾病的关联，清晰展现了科学前沿成果，极大地刷新了我对微生物世界的认知。

书中内容丰富多元，兼具专业深度与通俗表达。对微生物致病机理的解读深入浅出，对历史疫情的剖析惊心动魄。同时，图文并茂的呈现方式尤为亮眼：16页精美彩插，如中世纪天花病人的宗教画、黑死病“死亡之舞”、北欧瘟神传说，辅以百余张黑白插图。这些图像不仅是历史的注脚，更是集体记忆的显影剂——当我看到十九世纪伦敦霍乱地图上的死亡标记与现代卫星拍摄的亚马逊雨林砍伐影像时，生态失衡与疫病传播的因果关系跃然纸上。

读完本书，它极大地深化了我对于人类感染流行疾病的阶段性了解，也让我最终清晰地意识到传染病流行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作者在书中告诫我们，人类虽在疫苗、抗生素等领域取得突破，但生态环境因素在博弈中至关重要，人类行为对自然的影响往往决定胜负。阅读使我坚信，面对未来，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卫生服务质量、依靠智慧与科学应对疫情，成为必然选择。正如作者所言，只要人类存在，与微生物的决斗就不会终止。我们必须以更充分的准备，迎接下一次人与自然的新战争，在微观战纪中守护人类文明的未来。